

歷史研究法

呂思勉



永祥印書館刊



歷史研究法

編主泉范
庫文識知年青
種八十第 輯一第

呂思勉

刊館書印祥永

歷史研究法 目次

第一章 爲什麼要研究歷史·····	(一)
第二章 歷史的歷史·····	(八)
第三章 史學進化的幾個階段·····	(三〇)
第四章 舊時歷史的弊病何在·····	(二九)
第五章 現代史學家的宗旨·····	(三九)
第六章 作史的方法·····	(四九)
第七章 研究歷史的方法·····	(六〇)

第一章 爲什麼要研究歷史

歷史到底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有什麼用處？

提出這一個問題，我知道多數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鑒。什麼叫做前車之鑒呢？那就是從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認爲好的，我們可奉以爲法，照着他做；失敗的，大家認爲壞的，我們當引以爲戒，不照着他做。姑無論成功失敗，不盡由於做法的好壞；衆人所謂好壞，不足爲準；卽置以二者於弗論，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執着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那有不失敗之理？在社會變遷較緩慢之世，前後的事情，相類似的成分較多，執陳方以醫新病，貽誤尙淺，到社會情形變化劇烈時，就更難說了。近代世界大通，開出一個從古未有的新局面，我們所以應付之者，幾於着着失敗，其根源就在於此。所以憤激的人說道：歷史是足以誤事的。因

爲不讀歷史，倒還面對着事實，一件新事情來，要去考察他的真相，以定應付的方針；一有了歷史知識，先入爲主，就會借重已往的經驗，來應付現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爲成見所蔽，而不能見其真相了。如咸豐十年，僧格林沁給英法兵打敗了，薛福成的文集裏，有一篇文章，記載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說：「咸豐八年，業經把英法兵打敗了，這一次如能再打一個勝仗，則他們相去數千里，遠隔重洋，不易再來第三次，時局就可望轉機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戰敗一次，即不易三來？當日清朝腐敗的情形，是否再戰勝一次，時局即可望轉機？我們在今日看起來，可謂洞若觀火，而在當日，號稱開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這也無怪其然。當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無歷史知識，倒也不會作英法再敗即不易三來的推測。有了歷史知識，照歷史上的成例推測，相去數千里，遠隔重洋，而要與兵至於三次、四次，確是不容易的，無怪薛氏要作此推測了。據此看來，歷史知識足以誤事之言，並不能說他不對。然而沒有歷史知識，亦未嘗不誤事。當袁世

凱想做皇帝時，先由籌安會諸人列名發出通電，說要從學理上研究中國的國體問題，到底君主民主，孰爲適宜當時大家看見這個通電，就說：袁世凱想做皇帝了。我卻不以爲然。我說：這其中必然別有原故，深曲隱蔽，不可輕於推測。爲什麼呢？我以爲生於現今世界，而還想做皇帝；還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識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於此，以此推測袁世凱和籌安會諸人，未免太淺薄了，所以我有此見解。然而後來，事情一層層披露出來，竟爾不過如此，這不是一件奇事麼？此無他，還是缺乏歷史知識而已。據這件事情看來，歷史知識，是不會誤事的，所以誤事，還是苦於歷史知識的不足。這話怎樣講呢？須知道世界上是沒有全無歷史知識的人的。我們和人家談話，總聽得他說：從前如何如何，這就是歷史知識。所謂歷史，原不過是積從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專門的史學家，其知識之相去，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凱和籌安會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時，亦何嘗沒有他們的歷史知識？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豈能說是沒

有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反對的人，自然不會沒有的，然而據歷史上的成例推測，豈不可期其軟化？即有少數人不肯軟化，又豈不可望其削平？這個，據着他們僅有的、一偏的歷史知識推測，自亦可以作此斷案，自不免於希冀僥倖。倘使他們再多讀一些近代的外國歷史；倘使他們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點，知道歷史上的事情，前後不符的甚多，未可輕易的執着前事以推斷後事；他們自然不至於有此失着了。所以說：誤事的不是歷史知識，只是歷史知識的不足。

歷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認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倣，據歷史上的成例，以推斷事情，又易陷於錯誤，而沒有歷史知識，又要誤事，然則如何是好呢？須知道：應付事情，最緊要的，是要注意於學與術之別。學是所以知道事物的真相的，術則是應付事物方法。淺薄的人，往往說：我能夠應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他幹麼？殊不知你知道的事物的真相，應付的方法，自然會生出來，只有淺薄的應付方法，則終必窮於應付而後已。淺近些說：我們要做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

之類，有時而不湊手，怎樣呢？倘使你只會按照一定的樣子做，就要束手無策了。如其你明於原理，那就可以隨時變化。桌面上是要安放東西的，所以要是個平面，只要要是平面，其形狀是正方的，長方的，正圓的，橢圓的，甚而至於都不是的，卻不是頂緊要的條件。普通的桌椅，總是四隻腳，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則只要安放得牢，三隻腳也未嘗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夠撐定在中間，也未嘗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隻腳呢？這是舉其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況較活動的事？何況所應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則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夠知道呢？那史學家有一句名言道：「現在不能說明現在。」爲什麼現在不能說明現在呢？那是由於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會了解其然的性質的。我們要用一個人，爲什麼要打聽他的出身？爲什麼要打聽他的經歷？豈不以一個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經歷等等造成的，我們試再反躬自省：我爲什麼成爲這樣子的我，豈不和我所生長的家庭，我所肄業的學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

所從事的職業，都有很大的關係？倘使我生在別的家庭裏；在別的學校裏肄業；我所交往的朋友，換過一班人；我所從事的職業，也換成別一種；我豈能成爲現在的我？我們再放眼縱觀：我們所認得的人，爲什麼成爲他現在這個樣子？讀書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氣；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氣；生意人多少有些市儈氣；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氣；這是爲什麼？他們是生來如此的麼？然則中國的社會，爲什麼和歐洲不同？歐洲的社會，爲什麼和日本不同？甚而至於英國和美國不同；日本和朝鮮不同；就中國的社會，南北風氣，亦不能盡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長思了。尋常人對於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覺得不成問題。其實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遠的原因在內；深求其故，無不可以追溯至於極遠之世的。固然，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總不能真正尋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畢竟要好一些。然則歷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說：你的話是對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們如何能盡記，亦且如何能盡知？這話不錯。一天的新聞紙所載，奚啻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的幾萬萬萬分之一；

歷史的所載，又奚啻新聞紙的幾萬萬萬分之一；我們能知道什麼？歷史又何從談起呢？且慢，我們現在，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在社會上，佔如何一種位置？人家如何應付你？你沒有不明白的。我們所以能夠明白這些，豈不由於已往的記憶？然而我們已往的事，我們亦何嘗能盡記？然則我要明白我之所以爲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牢，只要記得其一，足以使我成爲現在的我的事情，「就夠了。在人如此，社會亦何獨不然？又何至於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記呢？然而問題就在這裏了。

第二章 歷史的歷史

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已往，不能明白其現在；任何一件事，求其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極遠；而又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這種說法，看似微妙，其實是容易明白的。問題就在：「對於已往的事情，要使其使現在成爲現在的，挑選出來，而我們現在所挑選，是否得當呢？」這話就很難說了。須知歷史，亦只是在一定的環境中，自然發生、成長之物，並不是自始即照着理想做的；更不是人類自始就有甚麼高遠的理想。說到此，則我們不能不一考究所謂歷史的歷史了。

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起來，歷史的起原，是很遠的，所以一開卷，就是些荒誕不經，渺茫難考的話。其實歷史比起人類的年齡來，是很小的。人類的年齡，假定爲五十萬年，則歷史的年齡，大約不過其百分之一；而且比較可靠的，還至少要打一個對折。我

們對於已往的知識，自不甘以此爲限。所以在沒有歷史的時代，也要想法子把他補作起來。因此，有所謂歷史時代和先史時代。所謂歷史時代，是當時的人，有意把他當時或以前的事，記載下來，傳給後人，而其所傳者，至今還有存留的。所謂先史時代，則這種遺留之物，已無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後人補作出來的。歷史的流傳，原不以語言和文字爲限，然由語言或文字流傳的，究居其極大部分；語言和文字，從廣義上說起來，原卽一物，文字不過是語言的擴大而已，然語言非藉文字，不能傳諸久遠；所以從大體上說，亦可以說：歷史時代，大略和有文字的時代相當，先史時代，則屬於未有文字的時代。

歷史時代，所流傳下來的，是些什麼東西呢？據我們所見到的，可以分爲下列幾種：（一）國家所設立的記事之官，卽所謂史官所記的。其中又分爲：（A）記事之史。其書之存於現在者爲春秋。（B）記言之史。其書之存於現在者爲尚書。（註一）（C）古代的法令、章程之類。其書之存於現在者爲禮。（註二）（D）貴族的世系，古稱爲

帝繫世本，簡稱爲繫世，但世本亦是他的通名。（註三）（E）古人自記其功勳，或記其先世功勳之作，卽所謂金石刻。（註四）（二）私人所傳述的故事，或偉大人物的言行，以其起於口耳相傳，故其後雖筆之於書，而仍稱爲語。（註五）大抵士大夫所傳述

註一

此係就整部的體例言，若記事、記言之史，零碎材料，存於古書之中的，則不可勝舉。又春秋爲記事之史，尙書爲記言之史，亦係就其大體言之，其中亦自有不能劃一之處，如禹貢卽並非記言之體。總之，古書編纂錯亂，體例總不能盡純，不可十分拘泥。

註二

小的爲一事的儀式，如儀禮所記是，大的則可以關涉國家行政機關的組織及法令的全般，古人亦稱爲禮，如周禮是。後世之唐六典，卽係做周禮而作的，明、清會典，又係做唐六典而作的。

註三

所以世本這部書，內容亦兼記帝王的統系。繫世的記載，據周禮，係小史之職。

註四

金屬的壽命，尤較石爲悠久，故古器物存於後世的，以金爲尤多。

註五

傳述一件故事或一個人的言行的，都謂之語。前者如武王克商之事，禮記樂記稱爲牧野之語是。後者如國語，是分國編纂的語；論語，論同倫類也，此書乃孔子及孔門弟子的言行，被分類編纂的。史記的列傳，其原本實稱爲語，所以在他篇中述及，尙稱之爲語，如稱淮陰侯列傳曰淮陰侯語是。

的，其所關涉之事較大，其說亦較近情理，農夫野老所傳述的，則正相反。但要考見當時社會的情況，以及較古的情況，反宜於後者求之，一入士大夫口中，就被其以「言不雅馴」四字刪去了。（註六）中國的神話，頗覺貧乏，其原因即由於此。（註七）

歷史的緣起，從心理方面說來，可以說：（一）屬於理知方面。因為人類有求知的慾望，所以（A）屬於無可解釋之事，亦要給他一個解釋，神話的起源即如此。（B）要記錄已往之事，以作將來辦事的根據或參考，國家設立史官的根原，就在於此。（C）要記錄已往的事，以作後人的法戒，其說已如第一章所述。（二）屬於情感方面。不論什麼人，都有一個戀舊而不忍忘記之感情，所以要把自己的經歷；或他人的事情，是他認為有意義的；傳述下來，留給後人。有這兩種動機，歷史就誕生出來了。但

註六 四字見史記五帝本紀贊。

註七 中國的神話，惟山海經及楚辭的離騷、天問等篇，包含較多。其見於雜書的，看似豐富，然多出後人偽造，至少曾經過改造，不甚可信。

是古人對於主客觀的分別，不甚清楚。所以（一）其所流傳，真正的事實，和自己的意思，往往混合不分，甚至全篇的話，都是以意構造的，和現在的小說一般，而亦用記事的形式，流傳下來，此即所謂寓言，最易使事實淆混。（註八）（二）更古的人，則連生物和無生物，人和動植物的區別，都弄不清楚了，所以又有所謂神話。（三）就是述及制度，也是如此的，孰爲當時實有的制度？孰爲傳述者的理想？二者並不分開。（註九）所以古代的史實，特別模糊。這種性質，大概秦、漢之際，是一個界限。在漢朝初

註八

古代所謂小說，乃謂其出於街談巷議，而不出於士大夫，說見漢書藝文志。事實出於虛構，如後世之小說者，古人謂之寓言。後世的小說，情節雖經理想化，事實或有根據，然其人名地名等，則必非真實，故不易與事實相混。古代之寓言，則正相反。情節出於虛構，而人名地名則多用眞者，如莊子盜跖篇，欲寓其一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成」的理想。乃捏造一孔子欲說服盜跖，反爲所大罵，幾至遇禍之事，即其一例。

註九

記制度者，以儒家之書爲最多。儒學分今古文兩派，今文言制度者，以禮記的王制篇爲總匯，古文以周禮爲大宗，皆係如此。諸子書言制度者，以管子爲最多，亦係如此。

年以前歷史所傳的如趙高指鹿爲馬之事如流俗所謂鴻門宴的故事（註十）都是說得天花亂墜，極有趣味，而細想一想，就知道其萬無此理的。其可信的程度，決不會超出後世的三國演義以上。秦、漢之際，尙且如此，前乎此者，就更不必說了。所以所謂古史，實當別爲一科，專門研究。（註十一）從漢朝統一天下以後，文化發達，傳述者的程度，驟然提高；可靠的材料，流傳下來的亦多（註十二）歷史便煥然改觀了。

史學的發達，不能不爲物力所限。古代作書的材料，簡牘笨重，縑帛價貴，而書寫

註十

見史記秦本紀及項羽本紀

註十一

因爲研究的人，各有專長，而古史的研究，有須於特別技術者尤多。至某書或某書的某部分，是否當屬於古史的範圍，則當以其是否具有此種性質而定，不能執時代爲斷。

註十二

前乎此者，採取不足信的材料，亦不能爲其人咎。因爲歷史是不能造作的，斷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作爲史實。流傳下來的，只有這樣的材料，自只能照其原樣，傳給後人。在採取他的人，原並不以爲可信，所以既採取之，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

又煩難，於是乎（一）著作難（二）而材料之蒐輯亦不易。所以能成立一部巨著的，非依靠國家，得其助力不可。司馬談、遷父子，世爲史官，卽其一例。但自隋以前，作史的人，雖借國家的助力，而其事則仍係私人的事業。雖然有時候編成某一朝的歷史，係出於國家的命令，亦都就有志於此，或業已從事於此者而命令之，國家不過給以某種助力而已。時代愈後，則（一）材料愈多，（二）所關涉的範圍亦愈廣，從分量 and 門類兩方面而論，都非一人之力所克勝，唐時遂開集衆纂修之例，此後就沿爲故事了。（註十三）向來論史學的人，多數偏袒私家著述，而賤視集衆纂修，這亦是一偏之見，其實二者是各有所長的。（註十四）況且一人獨著，事實上已陷於不可能，那也不必

註十三 可參看史通的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兩篇。其唐以後的事，拙撰的史通評，可以參看商務印書館本。

註十四 如晉書係集衆所修，其紀傳的凌亂和瑣屑，誠不能爲諱，然志却是好的，卽由聚集各專家，各用其所長之故。

去追慕他了。

著述的人，都要靠國家的助力，其事自然和政治接近了。因書寫材料之笨重和昂貴，以致書寫艱難，流傳不易的情形，自造紙術成功而一小變，至印刷術發明而一大變，然而從事於作史的，都是所謂士大夫，士大夫是以政治爲職業的，所以歷史注重政治的情形，始終無甚變動。政治方面的現象，昔人所重視的有兩種：（一）隨時發生的事情，如某年月日太子生，某年月日舊君死，新君立，某年月日某外國入寇之類，這是無從豫知的。（二）則政治上豫定一個辦法，以處理某種事務，此即所謂政治制度。其能行與否，誠未可知；行之而能歷多久，亦未可知；然既定爲制度，總是期其行之永久，至少亦是期其行之於某一時期之中的。這兩種政治現象，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總序中，各給了他一個名目，稱前者爲理亂興亡，後者爲典章經制。歷代的史籍，實以此二者爲記載的中心。所謂正史，他的體裁，大體上有紀、傳、表、志四種（註十五）本紀、列傳，是所以記前一類的事實的，志是所以記後一類的事實的，表則二者皆可用。

因其體例，於此兩種事實，能夠包括無遺，所以歷代功令，定爲正史。但紀、傳之意，雖在於記事，而以人爲單位，於事實未免割裂，不便觀覽（註十六）所以又有取別種體裁的書，與之並行。其記前一類事實，而以時間爲條理系統的，謂之編年；挑選若干大事，逐事詳其始末的，謂之紀事本末。記後一類事實的，有的通貫列代，如通典和文獻通考；是有的專詳一代，如兩漢會要。是其隨意記載，並無一定的範圍，或並無條理系統的，則稱爲雜史（註十七）專以人爲主，而記其事蹟的，則稱爲傳記（註十八）從前的歷史，所

註十五 史記尙有世家一體，乃係記載未統一前的列國的，後世已無其物，故諸史皆不用。歐陽修新五代史，襲用其名，實屬無謂。晉書有載記一體，原於東觀漢記。東觀漢記用以記開國時的羣雄，晉書則用以記割據諸國，然亦可以不必別立名目，故他書亦總稱爲列傳。

註十六 此不能爲司馬遷答，因古代的紀、傳，事實多不相關涉；其相關涉的，材料性質，亦各有不同，不能合併也。但後世襲用之，則使史事割裂。

註十七 又有神史、野史等名。其體例與正史同，而未列爲正史的，清四庫書目稱爲別史。

註十八 包括年譜等。傳記有專記一人的，亦有並列多人的，後者如高僧傳、著獻類微等都是。

取編纂的方式，重要的，大抵不外乎此。此外地理應當獨立爲一科。舊時書目，亦入史部之中，乃因（一）從前的地理，偏於考古，論其性質，大部分係讀史地理，不能獨立爲一科；（二）又舊時書籍，以經、史、子、集爲四大部，地理不能歸入經、子、集，勢不得不附於史部之中。目錄學的歸入史部，亦可說是出於後一個理由。此外如詔令奏議、職官等門，則只可說是未經編纂的歷史材料而已。時令亦列入史部，最爲無理，即以舊時的分部論，亦應列入子部天文家之中。史評一門，內容分爲（一）考證、評論史事，（二）論作史之法，二者同用一名，亦爲未妥。有史時代的史材，大致如此。

先史時代的史材，則不是求之於書，而是取之於物的。其物，從性質上言之，可分爲三類：（一）人類的遺骸。（二）古物。此門包括極廣，不論食物、衣服、用具、建築物、道路，及天產品等都屬之。能得實物固佳，如不能得，則得圖畫、模型，亦較但用文字說明者爲親切明白。惜乎從前繪畫之技不甚精，輾轉傳抄或翻刻，更易失其原樣；做製之物，亦多以牟利爲動機；（註十九）不盡可信而已。書籍，自其又一方面觀之，亦爲實

物，如宋版、元槧，可觀其紙墨字體，而知當時製造及印刷的技術。他種實物，更不待論，如鐘鼎，一方面可觀其銘刻，又一方面，即可觀其冶鑄的技術，其重要，實有過於根據其文字以考史事。中國從前，科學不發達，不甚知道實物的價值，屬於古物，偏重其有文字者，以致作偽者亦以此爲務（註二十）今後實不可不翻然改圖。（三）爲法、俗、法、俗二字，乃歷史上四裔傳中所用的。這兩個字，實在用得很好。法係指某一社會中有強行之力的事情，俗則大家自然能率循不越之事，所以這兩個字，可以包括法、令和風俗、習慣；而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在古代，亦皆包括於俗之中；所以這兩個字的範圍很廣，幾於能包括一個社會的一切情形。（A）法、俗的變遷，有的很遲，所以古代的法、俗，還存於現在，這固不啻目擊的歷史。（B）又其變遷，大抵有一定的途徑，所以

註十九 如古錢便是。

註二十 如殷墟甲骨文，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報告，偽造者確有其人，且有姓名及每偽造一

片的價格。

業經變遷之後，考察現在的情形，仍可推想已往的情形（C）而社會進化的階段，亦往往相類。所以觀察這一羣人現在的情形，可以推測別一種人前代的情形。社會學之所以有裨於史學，其根原實在於此。此種材料，有的即在地面上，有的則須掘地以求之。大概時代愈遠，則其有待於發掘者愈多。歷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愈遠愈好，所以鋤頭考古學，和史學大有關係。

第三章 史學進化的幾個階段

不論那一種學問，都是逐漸進步的，史學將來的進步，未知如何，這或者連他所要走的方向，亦非現在所能豫知。若回顧既往，則其進步，有歷歷可指的。我現在把他分做幾個階段，這可以看出史學發達的情形，而史學研究的方法，亦即因此而可知。

中國史學的進化，大略可以分做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把司馬談、遷父子做代表。他父子倆才有意網羅一切史材，做成一部當時的世界通史。（註一）在他以前，固非沒有知道看重歷史的人，所以有許

註一 所謂世界，總係以當時的人所知道的為界限，在近世世界大通以前，西洋人的所謂世界，亦係如此。所以史記實在是當時的世界史，而不是本國史。不但史記，即中國歷代的正史，稱為其時的世界史，亦無不可，因為他已經把他這時代所知道的外國，一概包括在內了。

多材料，流傳下來還有一部無名氏所作的世本史，學家稱他爲史記的前身；（註二）然總還是片段的、部分的保存而已，重視歷史的觀念，總還覺得未臻於圓滿，到他父子倆，就大不相同了。所以他父子倆，可說是前此重視史學的思想的結晶，亦可說是後世編纂歷史的事業的開山。這種精神，這種事業，可以說是承先啓後。後來許多史學家的著作，都是從此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

第二、自司馬遷以後，史學界有許多名家，不過覺得史料要保存，要編纂，以詒後人而已，編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劉知幾，才於此加以檢討。據唐書的劉知幾傳，和他同時，懷抱相類的思想的，有好幾個人，可見這是史學上進化自然的趨勢，劉知幾只是他一個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對於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評。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兩種，評論其可稱爲正史的，共有幾家；其體裁適用於

註二

世本亦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又有譜，即表的前身。有居篇，記帝王都邑；有作篇，記一切事物創作之原；爲書之所本。所以洪飴孫作史表，把他列在諸史之前。

後世的，共有幾種。（註三）對於材料的去取，以及編製的方法，文辭的應當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實爲作史方法的一個大檢討。

第三、劉知幾的史通，不過遵守前人的範圍，對其作法，加以研究而已。所謂範圍，就是何種材料，當爲史家之所取，何種材料，可以置諸不問，劉知幾和他以前的人，意見實無大異同，即可說他史學上根本的意見，和他以前的人，亦無大異同。到宋朝的鄭樵，便又不同了。他反對斷代史而主張通史，已經是史法上的一個大變。這還可說是史記的體例，本來如此，而鄭樵從而恢復之。其尤爲重要的，則他覺得前人所蒐集者，不足於用，而要於其外另增門類。他在通志的總序中，表示這種意見，而其所作的二十略，門類和內容，亦確有出於前人之外的。（註四）這可說是史學上的一個大變革了。

註三

見史通六家、二體、雜述三篇，六家係劉知幾認爲正史的，二體則六家之中，劉氏謂其可行於後世的，所以其古今正史篇所述，亦以此二體爲限，雜述則其所認爲非正史的。

第四、以從前的人所蒐輯的範圍爲太狹，而要擴充於其外；這種見解，從史學知識，當求其完全廣博而論，是無人能加以反對的，但是僅此門類，史料日日堆積，業已不勝其煩，不可徧覽了，何況再要擴充於其外呢？如此，豈不將使歷史成爲不可觀覽之物麼？然而要遏止這個趨勢，把材料加以刪除，卻又不可。這事如何是好呢？於此，中國的大史學家章學誠出來，乃想得一個適當處置之法。他把史材和作成的史籍，分爲兩物。儲蓄史材，務求其詳備，而作史則要提要鉤玄，使學者可讀。因史料的詳備，史家著述，才有確實的根據，和前此僅據殘缺的材料的不同。亦惟史材完備保存，讀者對於作者之書，有所不足，乃可以根據史材而重作。（註五）其大體完善，而或有錯誤。

註四

據總序自述：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誥、器服、樂、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十五略，都出自胸臆，不襲漢唐諸儒，此就內容而言。若以門類而論，則六書、七音、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乃全爲鄭氏所新立。

註五

一人的見解，總不能包括無遺，所以每一種歷史，本該有若干人的著作並行。

闕略之處，亦可根據史材，加以訂補。因其如此，所以作史者可以放大膽，實行其提要鉤玄，而不必有所顧慮。從前併史料和作成的史籍爲一談，一部書修成後，其所根據的材料，即多歸於散佚，（註六）作史的人，覺其可惜，未免過而存之，往往弄得首尾衝決，不成體例；而過求謹嚴，多所刊落，確亦未免可惜；知章氏之說，就可以免於此弊了。章氏此種見解，實可謂爲史學上一大發明。其他警關的議論還多，然其價值，都在這一發明之下。

第五、史材務求詳備，作史則要提要鉤玄，這在現今的史學家，立說亦不過如此。然則章學誠的意見，和現在的史學家，有何區別呢？的確，章學誠的意見，和現在的史學家，是無甚異同的。他的意見，和現代的史學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進一步，就和現在的史學家相同了。但這一步，在章學誠是無法再進的。這是爲什麼呢？那是由於現

註六 此本係爲物力所限，今後印刷術發達，紙墨價格低廉，此等狀況，可望漸變。

代的史學家，有別種科學做他的助力，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現代史學的進步，可說所受的都是別種科學之賜。史學所要明白的，是社會的一個總相，而這個總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會明白的。要求各方面都明白，則非各種科學發達不可。所以現在史學的發達，實得力於各種專門史的競出。各種專門史，日益進步，而普通史乃亦隨之而進步。專門史，嚴格論起來，是要歸入各該科學範圍之內，而不能算入史學範圍內的。所以說史學的發達，是受各種科學之賜。然則各種專門史，發達達於極點，普通史不要給他分割完了麼？不。說明社會上的各種現象，是一件事，合各種現象，以說明社會的總相，又是一件事，二者是不可偏廢的。社會是整個的，雖可分科研究，卻不能說各科研究所得的結果之和，就是社會的總相。社會的總相，是專研究一科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倘使強作說明，必至於鹵莽滅裂而後已。所以各種科學發達，各種專門史日出不窮，普通史，即嚴格的完全屬於史學範圍內的歷史，只有相傳而益彰，決不至於無立足之地。史材要求詳備，作史則要提要鉤元，是了，然史材要求詳備，不過是求

作史根據的確實，而各項史材，非有專門家加以一番研究，爲之說明，是不能信爲確實的。詳備固然是確實的一個條件，然非即可該確實之全，所以非有各種科學以資輔助，史學根據的確實，亦即其基礎的堅固，總還嫌其美中不足；而其所謂提要鉤玄的方法，亦不會有一客觀的標準，倘使各率其意而爲之，又不免要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了。所以章學誠高尙的理想，必須靠現代科學的輔助，才能夠達到。所以說：他和現代的新史學，只差了一步，而這一步，卻不是他所能達到的。這不是他思力的不足，而是他所處的時代如此。如以思力而論，章氏在古今中外的史學界中，也可算得第一流了。

思想的進步，是因乎時代的。第一階段，只覺得史料散佚的可惜，所以其所注意的在蒐輯、編纂。第二階段，漸漸感覺到蒐輯、編纂，如何才算適當的問題，所以其所注重的在史法。第三階段，則因知識的進步，感覺到史學範圍的太狹，而要求擴充，這可說是反映着學術思想的進步。第四階段，因史籍堆積甚多，再圖擴充，不免要使本身

膨脹破裂，而割棄則又不可而起，雖未說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性和精力、日力，既不能兼容幷包；而各個門類，以及每一門類中的各種材料，又都不容割愛；則勢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學若從章學誠的據點上，再行發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種專門史，亦必漸次興起；不過現在既和外國的學術思想接觸，自不妨借他的助力罷了。所以學問的進化，自有一個必然的趨勢，而現在所謂新史學，即作爲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個階段，亦無不可。

史學和文學，係屬兩事，文學係空想的，主於感情，史學係事實的，主於理知。所以在人類思想未甚進步，主客觀的分別不甚嚴密的時代，史學和文學的關係，總是很密切的，到客觀觀念漸次明瞭時，情形就不同了。天下的人，有文學趣味的多，而懂得科學方法的少，所以雖然滿口客觀客觀，其實讀起記事一類的書來，是歡迎主觀的敘述的。喜歡讀稗史而不喜歡讀正史；在正史中，則喜歡四史等而不喜歡宋以後的歷史；和其看現在的報紙，喜歡小報而不喜歡大報，正是同一理由。殊不知四史等的

敘述，全以主觀爲主，時代愈後，則客觀的成分愈多，作者只敘述事實的外形，而其內容如何，則一任讀者的推測，不再把自己的意思，夾雜進去了，這亦是史學的一個進步。

第四章 舊時歷史的弊病何在

從前的歷史，不適於現代人之用，這句話，是人人會說的，然則從前的歷史，其弊病果安在呢？

提出這一個問題來，我們所回答的，第一句話，便是偏重於政治。「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譜，」這一類的話，在今日，幾乎成爲口頭禪了。這些話，或者言之太過，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爲諱的。且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讀某一時期的歷史，必須對於這種生活情形，知道一個大概，這是無待於言的了。我們讀舊日的歷史，所知道的，卻是些什麼呢？我也承認，讀舊日的歷史，於這一類的情形，並非全無所得。然而讀各正史中的輿服志，所知者，皇帝和官員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車輛而已，平民的衣着，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卻並沒有記載，我們讀齊書的本紀，知

道齊明帝很有儉德。當時大官所進的御膳，有一種喚作裹蒸，明帝把他畫一十字形，分成四片，說：「我吃不了這些，其餘的可以留充晚膳。」胡三省通鑑注說：「在他這時候，還有裹蒸這種食物。是把糖和糯米、松子、胡桃仁，合着香藥做成的。把竹皮包裹起來蒸熟。只有兩個指頭大，用不着畫成四片。」（註一）裹蒸的大小，無關緊要，可以不必去管他。看他所用的材料和做法，大約就是現在嘉興細點中胡桃糕的前身，吾鄉呼爲玉帶糕，正是用糖和糯米粉、松子、胡桃仁製成的，不過沒有香藥而已。（註二）南北朝時，還沒有蔗糖，就是宋、元之間，蔗糖也遠不如今日之盛，胡三省所說的裹蒸，用何種糖不可知，齊明帝所吃的裹蒸，則所用的一定是米、麥糖。米、麥糖所製的點心，不甚宜於冷食，所以大官於日食時進之，等於現在席面上的點心，後來改用蔗糖，就變成現在的胡桃糕，作爲閒食之用了。又據南史后妃傳：齊武帝永明九年，詔太廟四

註一 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註二 因近代香藥輸入，不如宋、元時代的多而美。

時祭薦其先人所喜食之物。其中薦給宣皇帝的，有起麵餅一種。胡三省通鑑注說：「起麵餅，今北人能爲之。其餅浮輒，以卷肉噉之，亦謂之卷餅。」這似乎就是現在山東薄餅的前身。胡氏又引程大昌的話，說：起麵餅係「入教麵中，令鬆鬆然也，教，俗書作酵。」然則在宋元間，南人食麵，尙不能發酵。麵飯不發酵則不鬆美，我們觀此，頗可知古代北方雖多產麥，而北人仍以稻米爲貴，近代則不但北人喜食麵，即南人嗜麵的亦漸多的原因。這兩件事，我們自謂讀史鉤稽，頗有所得，然亦只是一鱗一爪而已。南北朝時，裹蒸究竟是較普遍的食品？還是帝王貴人所專享？發酵之法，究竟發明於何時，如何普及於南方？我們都茫無所知。然則我們讀史，雖可藉零碎材料，鉤稽出一些史實來，然畢竟知之不詳。這就不能不追恨當時的史家，所記太偏於政治，以致別種情形，只能因政治而附見了。我們雖能知道秦代的阿房宮、漢代的建章宮、宏大壯麗的情形，因而略知當時的建築技術，然究不能知秦漢時代普通的民居如何，其弊亦正在此。所以說舊史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爲諱的。

偏重政治的弊病，果何從而起呢？這有一個很深遠的原因在內。人類的作事，是有惰性的，沒有什麼新刺激，就只會模模糊糊，一切都照舊做去。古代國家，不過現在一縣大，所謂國君，僅等於現在的縣令，大夫略如鄉鎮長，士則保甲長之類而已；他們又都是本地人；所行的政治，自然能有影響及於社會。到後世，就遠不是這一回事了。君門萬里，出必警蹕清道，君和民終身沒有見過一面，（註三）平民於宮中之事，固毫無所知；生長深宮之君，於民間習俗，亦一無所曉。所謂禮樂等化民之具，在古代，是行之於共見共聞之地的，（註四）在後世，則只是君和大臣，在禁衛森嚴的地方，關着門去行，平民永遠不會看見，試問有何影響，能及於社會？現在罵政治不好的人，總說

註三

康有爲的歐洲十一國遊記說：「人們凡事，都易循其名而不察其實，如聽見外國有國王，便想像他是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我在比國，看見他的國王，從宮中步行出來，人民見他，都起立致敬，他也含笑點頭答禮，比中國州縣官的尊嚴，還相差得很多。」

註四

如古代的鄉射禮，意思便近於現在地方上的運動會。

他是紙上文章，實際沒有這回事。試問：以現在行政機關的疏闊；官吏和人民的隔絕；欲求其不成爲紙上文章，如何可得？所以在古代，確有一個時期，政治是社會上的重要現象；社會上的大事，確可以政治上的大事爲其代表；後世則久已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而人們的見解，總還沿襲着舊時，把後世的政治，看得和小國寡民的時代一樣。譬如現在，我們看報，看人家往來的信札，往往敘述社會現象之後，總有「未知當局者何以善其後也」一類的話，其實考其內容，其事都絕非政治所能爲力的。然而這種見解，並不是不讀書，沒有見識的人才如此，即號爲讀書明理的人，亦往往如此；其中少數傑出，能重視現實的人，雖明知其不然，然亦爲舊觀念所牽率，見之不能晶瑩；於是古代歷史偏重政治，後世亦就相沿不變了。這是社會科學上一個深切的弊病，現在議論起來，雖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實際應用，又往往陰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時很不容易徹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則偏重戰事，和過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因爲戰事總是

使政治發生顯著的變化的，而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總易被衆人認爲英雄之故。不錯，戰事確是能使社會起重大的變化的。然而要明白一件事，總得能知其原因結果，然後可謂之真明白。舊史所記的戰事，往往只是戰事而已，於其原因如何，結果如何，都茫無所及。（註五）此等記載，試問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時勢，時造英雄。」這兩句話，到現在，還有視爲難於論定的。其實所謂英雄，不過善於利用時勢而已。一個社會，到危急存亡的時候，能否有英雄出來，全看這社會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聽他的指揮，把反對他的人壓伏下去？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現的條件，而決不是有無這樣的人出生與否的問題，這是明白無疑的事。英雄造時勢一語，如何能與時勢造英雄並列呢？過分偏重軍事，則易把和平時代跳過了，如講生物學的人，只知道突變，而不知道漸變，這個能算懂得生物學

註五 便是對於戰事勝敗的原因，結果，亦往往說不出來。

麼？
「利人濟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
「嘯吟風月天容我，整頓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覺得只要有一個英雄出來，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忘卻自己應負的責任。其背負一些責任的，又容易模倣不適宜於時代的人物，甚而至於妄自尊大，陷於誇大狂的樣子。

還有，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用之太過亦有弊。不錯，愛國家，愛民族，是確有其理的；而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亦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適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於矯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這在歐洲，十九世紀後半期，各國的歷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國爲尤甚。亞洲新興的日本，此弊亦頗甚。中國人偏狹之見，較之德、日等國，可謂相差甚遠，然亦不能絕無。中國人之有此弊，是起於宋以後的。民族主義，原因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以後，受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固是題中應有之義。然感情與理性，須相輔而行，偏重感情，抹殺理性，就糟了。如中國宋以後盲目

的排外之論，是很足以僨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頗受其弊。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幾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論，一轉而爲變法維新，否則日本在此時，可以激成很大的慘禍的，雖然不至於亡國。朝鮮國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學末流的影響卻深，就竟爾暫時釀成亡國的慘禍了。大抵民族主義誤用的弊病有兩種。（一）是把本族看得過高，如德、日兩國，即犯此弊。（二）則把異族看得太低，如中國人總說蠻夷不知禮義，甚至比之於犬羊便是。這兩者之弊，都由昧於事實的真相而起。昧於事實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實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矯揉造作的歷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歷史，可以做他對證的藥。

還有，借歷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也是有流弊的。這又可分爲兩種：其一、借歷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如朱子編通鑑綱目，借書法以示褒貶，（註六）後人又爲之發明，

註六 書法是借一種記事的筆法，以表示對於其事的褒貶的。如某人罷官，罷不得當的，則書曰罷某

官某；如其人咎有應得的，則削去官名，但書某罷；如無好無壞的，則書某官某罷。

對於歷史上的人物，事跡，一一加以批評是。其二，則借此激勵讀史者的修爲，如昔人編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錄等，卽出於此動機。此二者，驟看亦似無甚弊病。然凡事都貴求真，（一）歷史上的記載，先是不確實的；（二）卽使確實，而一件事情，關係極爲複雜，亦斷非但據其表面所能論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評家，往往僅據往史表面上的記錄，其結果，多不免於迂腐或浮淺，就不徒無益於求真，而反足爲求真之累了。

還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頗深，中國卻無其弊，那便是借歷史以維護宗教。在西洋，所謂中世時代，歷史幾乎做了宗教的工具。是宗教事件則詳，非宗教事件則略，而其所以所評論，亦多數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這不但舊教，卽新教亦未嘗不如此，而且兩教都利用歷史，以爲攻擊的武器。中國亦未嘗沒有教，中國人所作的歷史，如佛家所記的釋迦本行，高僧事跡之類，然大家都只當他宗教中的書籍看，不把他當作歷史，所以不受其害。還有一種，竟無好好的歷史，而歷史事跡，都依附宗教書籍以傳之國，如印度、西藏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還有，存着一種以史事爲法戒，卽所謂前車之鑒的見解，亦足使史學深受其弊的，其說已見第一章。

第五節 現代史學家的宗旨

往史之弊既如此，所以救其弊者，又將如何？

不論什麼事情，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環境之內的，如其不知道他的環境，這件事，就全無意義了。現在試舉一個例。從前漢朝時候，有一個名將，喚做韓信。他有一次和敵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邊上，背對着水，這就是所謂背水陳，是犯兵家之忌的，因為沒有退路了。後來竟打了勝仗。人家問他，他說：「這亦在兵法上，不過你們不留意罷了。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後生麼？我所用的兵，不是訓練慣，統帶慣的，乃是臨時聚集來的烏合之衆，這和走到市集上，把許多趕集的人，聚攏來，使之作戰一樣，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自己想自己救命，誰肯出力死戰呢？」這是一件事。明朝時候，又有一個名將，喚做戚繼光。他練兵最認真。著有一部書，喚做練兵實紀，對於練兵的

法子，說得很詳盡。清朝的曾國藩，本來是個書生，不懂得練兵的，他初出來練鄉勇，就靠這一部書，做藍本，訂定一切規則，可見他這部書，對於練兵的方法說述的詳盡，也可見得他對於練兵的認真了。相傳當他檢閱時，適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動，可見他訓練之效。他所以南征北討，所向有功，絕非偶然了。這又是一件事。兩件事恰恰相反。在看重戰術的人，一定說韓信的將才，在戚繼光之上，能不擇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訓練的人，則又要說韓信的戰勝，只是僥倖；其實都不其然。韓信生在漢初，承戰國時代之後。戰國時代，本來是舉國皆兵的，所以在秦、漢之世，賈人、贅婿、閭左，（註一）發出去都可充兵。韓信所用的兵，雖說沒有經他訓練過，然戰爭的教育，

註一 這亦是當時所謂謫發、謫戍。謫是謫戍的意思，發有罪的人出去作戰，謂之謫；發出去戍守，謂之謫。

戍。賈人、贅婿，都不能算有罪，然漢時亦在七、三、謫之列，那不過因當時重農賤商，贅婿大概是沒有田產的，發他們出去當兵，免得擾累農民罷了。閭左，謂一條街巷的左半段。這是要發一條街巷裏居民的半去當兵，而古者地道尊右，把右邊算上首，所以發其左半的人出去，秦時會有此事。

是本來受過的，對於戰鬥的技藝，人人嫻習，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夠人自爲戰。戚繼光時代，則中國統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對於戰鬥的技藝，一無所知。若不加以訓練，置之活地，尙不能與敵人作戰，何況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爲陳，非斃於敵人鋒鏑之下，就要被驅入水了。所以韓信和戚繼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實則相成，若非知其環境，就無從了解其真相了。況且事實原因環境而生，若不知其環境，對於事實的性質，必也茫無所知，更何論了解其經過。然則對於史事，安可不知其環境呢？

然而我們現在，對於任何史事，總不能十分明白其環境，這是什麼理由？這自然是由於記載的缺乏了。記載爲什麼會缺乏呢？難道向來史家，對於不知環境則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麼？不，須知「常事不書」，爲秉筆者的公例。我們現在，雖追恨古人，敘述一事件時，不把他的環境，說述清楚，以致我們不能了解，然使我們執筆爲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與古人，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將來讀書的人，還不免要追怨着我們。這是因爲著書的人，總得假定若干事實，爲讀者

所已知，而不必加以敘述，如其不然，就要千頭萬緒，無從下筆了。你天天記日記麼？一個朋友，忽而今來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豫算範圍內的事情；這自然要記出來的。學校中的課程，個個星期是一樣；吃飯、睡覺，天天是一樣；那就決無逐日記載之理，至多每學期開學之初，把課程表抄一份在日記裏，以後每逢變動時，再加以記載；初記日記時，把吃飯和睡覺的時刻，記下一筆，以後則逢一頓宴會，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記載罷了。這就是所謂常事不書，是秉筆者不得不然的。然而社會的變遷，雖然看不見，卻無一息不在進行之中。雖其進行無一息之停，卻又「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沒人看得見一樣。然而隔着一個時間再去，就移動了許多了。社會的變遷，亦是如此，必須隔着若干年代，然後看得出。然而人壽太短，所以除非生於劇變時代的人，總不覺得他有多大的變動。尋常人所覺得的變動，總是聽見父輩、祖父輩，甚或是曾、高祖父輩的人所說的，這種說述的人，尙或出於傳聞而不是親見，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親切；而且這

些零碎的事實不能通其前後而觀之則亦不過是一個一個小小的變動而已並不覺得如何驚心動魄；把他記載下來的人，自然少了，隔了較長遠的時代，再把今昔的社會，一加比較，固然也覺得他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變遷的時代，業已相離很遠，無從知其因變遷生出來的影響，自更無人注意及之了。所以社會的變遷，我們所知道的，怕不過百之一二，對於任何時代的情形，我們都是茫然，自然對於任何事件的環境，我們都不明白了。

不知環境，對於任何事情總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對於任何時代，亦都不能明白，這卻如何是好呢？所以現在的史學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謂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時代，雖然已往了，我們卻要綜合各方面，使其時代的情形，大略復見於眼前。史事有「特殊事實」和「一般狀況」之分。對於特殊事實，普通的見解，總以為時代愈接近的人，則知之愈真切，其實不然。這許多事情，往往要隔了一個相當的時期，然後漸明；再隔了一個較長的時期，然後大白的。因為許多事情，都有

其內幕，而其內幕，在當時總是祕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洩，更不能宣洩；局外人既不能宣洩，亦或不肯宣洩；必隔了一個時期，其材料才得出現。而且局中人無論矣，卽局外人，亦免不了利害和感情上的關係，其見解總不能平允，見解既不能平允，自然所述不能真實，亦必隔了一個時期，此等關係，漸成過去，其所傳的材料，方能真確。又有許多事情，其內幕是永不宣洩的，所謂如何如何，只是後人據其外形，參以原因、結果、推測而得，這亦非待至事後各方面的材料大略出現之後，無從推測。這種便利，都是當時的人，或其時代較爲接近的人所沒有的：所以特殊事實，看似當時的人，最爲明白；時間愈接近的人，則愈明白；其實適得其反。我們來談唐、宋、元、明時代的特殊事實，必有一部分非其時之人所知；將來的人，談現在的歷史，亦必有一部分非我們所能及。至於一般狀況則不然，現在的上海，物質生活是怎樣？人情風俗是怎樣？將來的人，無論是怎樣一個專家，對於現在的上海，無論研究得如何精密，其了解的深切，總還不如現在久居上海的一個無甚知識的人。固然，他或有種種知識，爲現在的老上海

所不及的，然這只是多知道了若干零碎的事實，對於現在整個上海的性質的了解，決出於現在所謂老上海者之下。若使現在的上海，而發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使將來的專家和現在的老上海，同來猜想其原因，逆料其結果，將來專家的所言，決不如現在老上海之近理。所以以當時的人，了解當時的事，只是苦於事實的真相，不能盡知，如其知之，則其了解之程度，必出於異時人之上。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緊。

已往者已往矣，何法使之再現？難道能用奇祕的攝影術，使古事再見；奇祕的收音機，使古語可聞麼？起若干來，給後人知道，已往的事，是決然無法的了，其實不然。所謂一般狀況，乃是綜合各種事情而推想出來的。並不是指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若專指一人一事，那又是特殊事實了，我們現在，有許多前人所遺留下來的重大的特殊事件，尚且不能了解其時的社會，何況但保存一二瑣屑的事情呢？若說我們保存得多，則豈能把現代的情形，一一保存下來？還不過和前人一樣，假定若干事物為後人所能知，則置諸不

論不議之列，其爲我們所逆料，以爲將來之人將不能知之事，則保存一二罷了。此與前人之所爲，亦何以異？至多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要以現代人之所爲，省卻將來的人蒐輯、推測之勞，決無其事。而史家的能力，就是在於蒐輯、推測的。倘使能蒐輯、推測，前代的情形，雖然已成過去，仍有使之再見到某程度的可能。我們現在所苦的，乃是這種材料之少，而無從據之以資推測，然此種材料雖少，我們所用的蒐輯的工夫，怕比他更少。況且我們於現存材料之外，還有發見新材料的可能。

所以現代史學上的格言，是「求狀況非求事實。」這不是不重事實，狀況原是靠事實然後明白的，所以異於昔人的，只是所求者爲「足以使某時代某地方一般狀況可藉以明白的事實」，而不是無意義的事實而已。所以有許多事情，昔人視爲重要，我們現在看起來，倒是無關重要，而可以刪除的。有許多事情，昔人視爲不重要，不加記載，不過因他事而附見的，我們現在看來，倒是極關重要的，要注意加以蒐輯，上章所述的裹蒸和起麵餅，似乎就是一個例子。所以求狀況的格言，是「重常人，重

常事，「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

蒐輯特殊事實，以求明瞭一般狀況，這是很難有刻板的方法可說的。大致說起來，亦不外乎所知者博，則所測者確，所以蒐輯是最緊要的事。所蒐輯的材料，大致說起來，亦可分爲物質狀況和社會狀況二者。譬如古代的地理，和現在不同，就是自然狀況有異，（註二）住宅、道路等亦然。又如考校某時代的學術思想如何，便可推測其時的士大夫，對於某種政治上的事件，懷抱何種感想？若再博考其時平民社會的情形，則又可推測其時的老百姓，對國事的態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對待國事的態度，就可解釋其時政治上某種事件，當局者何以要取某種措置的理由，并可評論其得失。這是舉一端爲例，其餘可以類推。「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

註二 譬如古代的長江，比現在闊，所以南北戰爭，長江爲天險的性質較後世爲甚。

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則其戰術的不同，亦只是當然的結果，如風化之於山崩而已。

第六章 作史的方法

作史，似乎是研究歷史的人所談不到的，然而現在的歷史，正在要重作之中，惟其知道作史的方法，才能知道研究的方法，所以作史的方法，也不可以不一談。

歷史該怎樣作法呢？那在理論上是無疑義的。第一、當先蒐集材料。第二、當就所蒐集得的材料，加以考訂，使其正確。然後第三、可以着手編纂。

史事的要蒐輯、訂正，是永無窮期的。外行的人，往往以爲「歷史的材料，是一成不變的。至多（一）有新發見的事實，加一些進去；（二）舊材料不完全，不正確的，被發見了，則加以補充，加以訂正；如此而已。這兩者都不能多，所以歷史的材料，從大體上可以說是固定的，無甚變動。」這種見解，其實是錯誤的。歷史上的年代，如此之長，事實如此之多，即使我們所蒐輯的範圍，和從前人一樣，亦不易有完備之日。何況

研究的範圍，是時時變動的，無論你方法如何謹嚴，如何自許爲客觀，入於研究範圍之內的，總是反映着其時代所需要。一物有多少相，是沒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註一）看的人沒有了，就相也沒有了。哲學家說：「世界上沒有兩件相同的東西，因爲至少他所佔的時間或空間是兩樣。」然則以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人，看起來歷史上的事件來，其觀點如何會相同？觀點不同，其所見者，亦自然不同；所覺得要補充，要刪除的，自亦隨之而異了。所以史學一日不息，蒐輯之功，亦即一日而不息。這話或者說得太玄妙些，然即使淺而言之，現代各種科學勃興，我們從前不甚注意，不甚了解的事實，現在知其重要的何限？豈能屏諸研究範圍之外？然則史學的範圍，安得而不擴充？範圍擴充，蒐輯的工作，安能不隨之而增加呢？科學的進步，永無止境，史家蒐輯的工作，自亦隨之而無窮了。至於訂正，則從前人的記載錯誤的，見解不正確

註一 因爲沒有兩個看，能佔同一的空間與時間。

的，淺而言之，即隨處可見。此等或可說：終有訂正至正確的一日，而有的或竟無法可想了，則訂正亦似有窮期。其實亦不然。真正客觀的事實，是世界上所沒有的。真正客觀的事實，只是一個一個絕不相聯屬之感覺，和做影戲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他聯屬起來，試問有何意義？豈復成爲事實？所謂事實，總是合許多小情節而成，而所謂小情節，又是合許多更小的情節而成，如是遞推，至於最小，仍是如此。其能成爲事實，總是我們用主觀的意見，把他聯屬起來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觀的事實？既非客觀，安得云無變動？這話或者又說得太玄妙些，然而一件事實的真相，不但限於其外形，總得推見其內部，這總是人人可以承認的，如此，則因社會狀況的不同，人心的觀念，即隨之而變，觀念既變，看得事情的真相，亦就不同了。（註二）史事的訂正，又安有

註二

譬如在從前尊信士大夫階級的時代，看歷史上的黨爭，或以爲一方面確係君子，一方面實屬小人，或以爲兩方面都係君子，出於誤會。到現在，知道了階級的性質，就知道無論那一方，不會全是君子，其中真爲國家社會起見的，總不過是極少數人了。

窮期呢？蒐輯永無窮期，訂正永無窮期，歷史的當改作，即已永無窮期，何況歷史不是蒐輯，考訂了便算了事的，還要編纂成功，給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隨時不同的，然則歷史安得不永遠在重作之中呢？

以上所說的，都是原理，以下且談些具體的方法。

蒐輯的對象，當分爲書本和非書本二者。非書本之物：即（一）人類的遺骸，（二）古物，（三）法俗，已如第三章所述。此當隨時蒐輯，其最重要的來源，爲（一）考古學上的發見，及（二）各種新調查。這二者，在現在的中國，材料還不多，我們只能儘其所有，充分的加以利用。書本上的材料，則可謂汗牛充棟。一個人的研究，總有一個範圍，（註三）在範圍內的材料，自然有一個限度。但這種材料，很難斷定某一部書內沒有，於是每研究一個題目，就非把所有的書看遍，或看其十之七八不可，此豈人力

註三 如劃定時間，地域，或擇取某一事件等。

所能及？從來著書的人，無論如何勤苦，怕也沒人敢說：材料的蒐輯，業已一無遺漏，或者十得八九的。然而考證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條證據，少一條證據，（註四）事相即爲之大變，材料的蒐輯，不能完全，總是史學家一個遺憾。然則如之何呢？絕對的理論上的完備，自然是不可能的，然亦總得盡我們之力，做到大體上沒有遺憾的地位。如此說來，則我覺得史料彙編，在今日實爲當務之急。所謂史料彙編，便是把每一個題目，（註五）遍覽羣書，把其中有關係的，都抄錄下來，註明篇名卷數或頁數，及所據的版本。（註六）此自非一二人之力所及，當集羣力，以大規模的組織行之。此即昔人編纂類書之法。中國歷代，多有大類書的編纂。（註七）這能替研究學問的人，把他所需要

註四 如發見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條。

註五 無論其爲時間別，地域別，或擇取某事件。

註六 不同的刻本，須互相校勘，見於類書或他書所徵引者亦然，所以又涉及校讎問題。

註七 從魏朝的皇覽，到清朝的圖書集成。

的材料，彙集在一處，省卻他自行蒐輯之勞，所省下來的工夫，就可用之於研究上了，其用意實爲最善，惜乎其所編纂的，都不甚佳而已。（註八）在現代，實在各種學問，都當以此法行之，而史家相須爲尤急。（註九）編纂史料彙編，當用前人作史抄的方法。所謂史抄，是把從前人的著作，依着我所定的條理系統，抄集下來的。不改动原文。但遇兩書材料相同的，則去其重複，然亦仍須註明。（註十）有須刪節處，亦須註明刪節。總使人家看起來，和看原書一樣。爲什麼必要用這種體例呢？那是因爲讀史總要據原始材料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史事的真相，就是據字句推勘而得；所以字句一有變動，又要生出一番校勘之勞，這個殊不犯着，所以要一概照抄，如有意見，則另註於下。

註八 因爲私人之力不及，而官修之書，又每不盡善。

註九 論整理國故的人，總說舊學術要算一筆總帳，並類書亦是算總帳最好的法子。

註十 如史記與漢書、宋齊、梁、陳、魏、周、隋書與南北史是。有一字的異同，亦須註明，無之則但註某書某篇同。

善用這種體例的，亦可以成爲著作，如馬驢的釋史，便是一個例子（註十二）此種書籍，能合羣力爲大規模的編纂固佳，即私人亦未嘗不可爲。那便是：（一）擇定一個題目，罄畢生之力而爲之，盡其所能，做到什麼地步是什麼地步，其未竟之緒，則留待後人廣續。（二）或者選定若干部書，把他分門別類的抄撮起來，抄得幾部是幾部。這種辦法，對於一個題目，固然極不完全，然使各種書籍，都有人抄，而所定的門類，又大致相等（註十三）則合而觀之，亦不啻一完備的史料彙編了。駁我的人要說道：「彰明較著，一望而知爲與某題目有關係的材料，固然可以集衆或由有志的人彙抄。然而史學的進步，總是從衆所不能見，即置之眼前，亦不能知其有何關係的材料中得來的，此豈非專家所能着手？」這話固然不錯。然此乃無可如何之事。彙抄之作，原只能省衆所共見的材料，的蒐輯，然把這種工夫，替研究者省下，所得業已不少。外國學

註十一 羅泌的路史，材料實較釋史爲豐富而可貴，如用釋史的體例作成，當更可貴。

註十二 如能劃一，自然更好，但恐不易辦到，即亦不必勉強。

者著書，往往有延聘助手，代其蒐輯材料的，就是爲此。何況專家新發明、新訂正的史料，我們亦可分類抄撮呢？

考訂史事的方法；外形上記載的同異，是容易見得的，只要蒐輯得完備，校勘得精細。但現在所當致力的，殊不限於此。大抵原始的史料，總是從見聞而來的，傳聞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實親見者亦何嘗可信？人的觀察，本來容易錯誤的。即使不誤，而所見的事情，稍縱即逝，到記載的時候，總是根據記憶寫出來的，而記憶的易誤，又是顯而易見的。況且所看見的，總是許多斷片，其能成爲一件事情，總是以意聯屬起來的，這已經攙入很大的主觀的成分。何況還有沒看見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補綴呢？這種錯誤，是無論何人，不能免掉的，如其要免掉，那就世界上沒有史事了。這還是得之於見的，其得之於聞的，則傳述者又把這些錯誤，一一加入。傳述多一次，則其錯誤增加一次。事情經過多次傳述，就無意間把不近情理的情節刪除或改動，而把有趣味的情節擴大起來。看似愈傳述愈詳盡，愈精彩，實則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這

還是無意的，還有有意的作偽。那便是：（一）偽造假的事實，（二）抹殺真的事實，如清朝人的燒毀書籍，改作實錄，就是其例子。這是有所爲而爲之的，還有（三）無所爲而出於遊戲性質的。如東晉晚出的偽古文尚書，到底是何人所造，至今很難論定。程魚門晚書訂疑說他是遊戲的擬作，其說亦頗近情理，此說如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古今來的偽書，亦可說是汗牛充棟。辨僞之法，近人論者頗多，此書爲篇幅所限，不再詳述，以上所述，實在還都是粗淺的，若論其精微的，則憑你一意求真，還是不能免於不確實，雖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因爲人的心理，總有一個方向，總不能接受和這方向相反的事情。所以又有許多真確而有價值的事情，爲你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心理上這種細微的偏見，是沒有徹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當的程度，也很不容易。讀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可見。史事的不足信如此，無怪史學家說：「歷史只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史學家爲求真起見，在這上面，就得費掉很大的工夫。

史料的真偽，鑒別得、考訂得覺其大體可信了，然後我們可進而批評史事。歷史上任何事件，把現在的眼光看起來，總覺得其不甚可信。明明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反說得他詐偽陰險（註十三）明明是件深曲隱蔽之事，說來反覺得其淺顯易明；這些真是隨處可見。而只知其外表，不知其內容的，更不知凡幾。讀史者於此，往往模模糊糊，不加注意；或則人云亦云；其偶有所見的，又或痛詆古人的錯誤，其實此亦不然。一件事，所能看見的，總只是外形，其內容如何，總得由觀察者據着外形去推測。我們該盡我們考證之所能，推測之所至，盡量的把史事的真相，闡發出來。不過推測總只是推測，不能逕認爲事實而已。在這一點上，昔人著述的體例，未盡善處很多，實有改良的必要。

歷史不但因時代而不同，其所懸擬的讀者，亦各不同。各種不同的讀者，而只供

給他一種書，是不很適宜的。（註十四）就供給一種人看的歷史，也應有幾種同時並行，以資參證；而作史者亦得各抒所見；這是於史學大有裨益的。其好壞，最好任人評論。從前功令，定某種書爲正經正史，使人把他的價值，看得特別高，這種辦法，頗不適宜。我們當祛除成見，平等相看，其信否的程度如何，一以我們按照嚴格的史學方法所評定者爲斷。

註十四 如資治通鑑，本意係供君主閱覽，以供平民閱覽；實不盡適宜。

第七章 研究歷史的方法

歷史的性質，及其發展的經過，和現在的觀點，都經大略明白了，那我們就可以進而談歷史的研究方法了。

現在要想研究歷史，其第一個條件，就是對於各種科學，先得要有一個常識。治史學的人，往往以為社會科學，是緊要的，自然科學，則不甚重要，實亦不然。有許多道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相通的。如演變的觀念，若不知道生物學，就不能知道得真確。又如治歷史，要追溯到先史時代，則史家對於地質學，豈能茫無所知？這是舉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所以治史學的人，對於現代的科學，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則用力雖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無以異了，安足稱為現代的學問家？固然，各種社會科學，如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人生哲學等，和史學的關係，更為密切。然只能謂治史

學者，對於此等學科，更須有超出常識以外的知識，而不能說此外諸學科，可以并常識而不具。現在再把治史學的人所宜特別加意的幾種學科，略說其關係如左：

治史學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會學了。歷史是研究整個社會的變遷的，任何一種事件，用別種眼光去解釋，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會學，才可謂能攬其全。而且社會的變遷發達，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其現象似乎不同，其原理則無以異。明白了社會進化的法則，然後對於每一事件，都能知其進化的長途中所具有的意義；對於今後進化的途徑，自然也可以預測幾分。如蠻族的風俗，昔人觀之，多以為毫無價值不加研究。用社會學的眼光看起來，則知道何種社會有何種需要，各種文化的價值，都是平等的，野蠻民族的文化，其為重要，正和文明民族一樣。而且從野蠻時代看到文明時代，更可知其變遷之所以然。所以我曾說：近代的西人，足跡所至既廣，他們又能尊重科學，為好奇心所驅迫，對於各種蠻族的風俗，都能盡量加以研究，這個對於史學的裨益，實非淺鮮。因為他在無意中，替我們把歷史的年代延長了，（註一）就是

使我們的知識，加幾倍的廣博。這亦是舉一端爲例，其餘可以類推。

把歷史的年代，延得更長的，就是考古學了。史學家說：「假定人類的出生，有二十四萬年，我們把一日設譬，則每小時要代表二萬年，每一分鐘要代表三百三十三萬年，最古的文化，在十一點四十分時候才出現；希臘文化，離現在只有七分；蒸汽機的發明，則只有半分鐘而已。所以通常所謂古人，覺得他和我們相離很遠的，其實只是同時代的人。」這種說法，所假定的人類出生的時期，爲時頗短，若取普通的說法，很有加長一倍的可能，那我們歷史上的文化，更淺短得不足道了。然即此假定，亦足以破除普通人的成見了。

自然科學中，對於歷史，關係最密切的，自然是地理學。這因爲人類無一息之間，能不受自然的影響，而地理學是一切自然條件的總括。這種道理，在現今，是人人知

註一 現代蠻族的情形，和我們古代的情形相像，看了他，就可追想我們古代的情形了，所以說是歷史年代的延長。

道的，無待再說。但在歷史上，地理形勢，不必和現在相同，把現在的地理情形，去解釋史事，就要陷於誤謬了。所以治史學者，對於歷史地理，不能不有相當的知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各時代地面上的情形和現在不同的，因以推知其時的地理及於其時人類的影響，和現在的不同。（註二）不可如從前人，但偏於軍事上的研究。

治史學的人，雖不是要做文學家，然對於文學，亦不可不有相當的了解。其中（一）是訓詁。這在治古史，是人人知其重要的，然實並不限於此。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語言，又有其時的專門名詞，如魏、晉、南北朝史中之寧馨、是處、若爲、宋史中的推排、手實、稱提等都是。（註三）這些實該各有其專門的辭典。（二）文法，亦是如此。這個在古代，讀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可知，後世亦可以此推之。（三）普通的文學程度，

註二 錢君賓四，曾對我說，有意做這樣一部書，這是極緊要，極好的事情，然此事恐不易成。

註三 寧馨猶言這個，是處猶言處處，若爲即如何的轉音。推排是查亂的意思，手實是按一定的條件，自行填法。稱提乃紙幣跌價收回一部分，以提高其價格之意。

尤其要緊。必能達到普通的程度，然後讀書能夠確實了解，不致於隔膜、誤會。況且在古代，史學和文學，關係較深，必能略知文學的風味，然後對於作史者的意旨，能夠領略。晚出古文尚書的辨偽，可謂近代學術界上的一大公案。最初懷疑的朱子，就是從文學上悟入的。他說：「今文尚書，多數佶屈敖牙，古文尚書，則無不平順易解，如何伏生專忘掉其易解，而記得其難解的呢？」清朝的閻若璩，可說是第一個用客觀方法，辨古文尚書之偽的人，到他出來之後，古文尚書之爲偽作，就無復辨解的餘地了，而他所著的古文尚書疏證中有一條，據胤征篇的「每歲孟春」一句，說古書中無用每字的，因此斷定其爲魏晉後人的偽作。宋朝的王應麟，輯魯齊韓三家詩，只輯得一薄本，清朝的陳喬樞所輯得的，卻比他加出十倍。陳喬樞的時代，後於王應麟，有好幾百年，只有王應麟時代有的書，陳喬樞時代沒有，不會有陳喬樞時代有的書，王應麟時代沒有的，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陳喬樞有何異術，而能所得的十倍於王應麟呢？那是由於古書有一種義例，爲陳喬樞所知，而王應麟所不知。原來自西漢的今文經學以

前，學術的傳授，都是所謂專門之學，要謹守師法的。（註四）所以師徒數代相傳，所說的話，都是一樣。我們（一）固可因歷史上說明甲係治某種學問，而因甲所說的話，以輯得某種學問的佚文，（二）並可以因乙所說的話，和甲相同，而知道乙亦係治某種學問。如是再推之於丙、丁等等，其所得的，自非王應麟所能及了。然則甲、乙、丙、丁等所說的話的相同，並不是各有所見，而所見者相同，還只是甲一個人所說的話，我們治古史，搜羅證據，並不能因某一種說法，主張者多，就以爲同意者多，證據堅強，這亦是通知古書義例，有益於史學的一個證據。

講學問固不宜豫設成見，然亦有種重要的觀念，在治此學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則就茫無把握了。這種重要的觀念，原只是入手時的一個依傍，並沒叫你終身死守着他，一句不許背叛。現在就史學上的重要觀念，我所認爲讀史之先，應該豫先

註四 這所謂專門之學，與現在所謂專門之學，意義不同，非以學問的性質分，而以其派別分。

知道的，略說幾條如左：

其中第一緊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進化的，打破昔人循環之見。有生命之物，所以異於無生物；人所以特異於他種生物，就在進化這一點上。固然，世界上無物不在進化之中，但他種物事，其進化較遲，在一定的時期中，假定他是不變的，或者尚無大害。人類的進化，則是最快的，每一變動，必然較從前有進步，（註五）這種現象，實在隨處可見。然人類往往爲成見所蔽，對於這種真理，不能了解。尤其在中國，循環的觀念，入人甚深。古人這種觀念，大概係由觀察晝夜、寒暑等自然現象而得，因爲此等現象，對於人生，尤其是農、牧民族，相關最切。這其中，固亦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把他適用於人類社會，就差了。粒食的民族，幾曾見其復返於飲血茹毛？黑格爾的哲學，徒逞玄想，根腳並不確實；而且不免偏狹之見；有何足取？然終不能不推爲歷史哲學的大家，

註五 有時看係退步，然實係進步所走的曲綫。

而且能爲馬克斯的先導，就是因爲他對於歷史是進化的的見解，發揮得透澈呀！

第二、馬克斯以經濟爲社會的基礎之說，不可以不知道。社會是整個的，任何現象，必與其餘一切現象都有關係，這話看似玄妙，其實是容易明白的，佛家所說的「帝網重重」就是此理。（註六）然關係必有親疏，（註七）影響亦分大小。地球上受星光之熱亦不少，豈能把星光的重要，看作和太陽光相等？把一切有關係的事，都看得其關係相等，就茫然無所了解，等於不知事物相互的關係了。如此，則以物質爲基礎，以經濟現象爲社會最重要的條件，而把他種現象，看作依附於其上的上層建築，對於史事的了解，實在是有很大的幫助的。但能平心觀察，其理自明。

第三、近代西洋科學和物質文明的發達，對於史事，是大有影響的。人類最親切

註六 帝字是自然的意思，帝網重重，猶言每一現象，在自然法中，總受其餘一切現象的束縛，佛家又以

一室中同時有許多燈光，光光相入設譬，亦是此意。

註七 親疏，就是直接，間接。

的環境，使人感覺其苦樂最甚的，實在是社會環境，這固然是事實，然而物質環境，既然是社會組織的基礎，則其有所變動，影響之大，自更不容否認，在基礎無甚變動時，上層建築，亦陳陳相因，人生其間的，不覺得環境有何變動，因亦認為環境不能使之變動，於是「世界是不變的」，「即有變動，亦是循環的」，「一切道理，古人都已發見了」，「世界永遠不過如此，無法使之大進步，因而沒有徹底改良的希望」，這種見解，就要相因而至，牢不可破了。科學發達了，物質文明進步了，就給這種觀念以一個大打擊。惟物質文明發達，而人類制馭自然之力始強，人才覺得環境可以改變；且可用人類的力量使之改變，人類因限於物質所受的種種苦痛，才覺得其有解除的可能。惟物質文明發達，而社會的組織，亦隨之而大變，人才覺得社會的組織亦是可變的，且亦可以用人類的力量，使之改變的。又因物質文明進步所招致的社會變遷，使一部份人大感其痛苦，人才覺得社會實有加以改革的必要。惟物質文明發達，才能大變交通的情形，合全球為一家，使種種文化不同的人類，合同而化。惟科學發達，

人才不爲淺短的應用主義所限，而知道爲學問而學問的可貴，而爲學問而學問的結果，則能有更精深的造詣，使人類的知識增加，而制馭事物之力，亦更因之而加強。人類的觀念，畢竟是隨着事物而變的。少所見多所怪的人，總以爲西洋和東洋，有多大的差異，聞見較廣的人，就不然了，試將數十年以前的人對於外國的見解，和現在人的見解，加以比較便知。然不知歷史的人，總還以爲這小小的差異，自古卽然，知道歷史的人，見解就不同了。西洋現在風俗，異於中國的，實從工業革命而來，如其富於組織力，如其溺於個人的成功都是。前乎此，其根本的觀念，原是無大異同的。所以近代西洋科學及物質文明的發達，實是在通於全世界劃時期的一個大變。

第四、崇古觀念的由來，及其利弊，亦不可不加以研究的。人人都說中國人崇古之念太深，幾以爲中國人獨有之弊，其實不然。西洋人進化的觀念，亦不過自近世以來。前乎此，其視邃古爲黃金時代；其謂一切真理，皆爲古人所已發見；亦與中國同。而且不但歐洲，世界上任何民族，幾乎都有一個邃古爲黃金時代的傳說，這是什麼理

由呢？崇古的弊病，是很容易見得的。民國三十四年之後，只會有三十五年，決不會有三十三年，然而三十四年的人，是只會知道三十三年以前，決不會知道三十五年以後的。所以世界刻刻在發展出新局面來，而人之所以應付之者，總只是一個舊辦法。我們所以永遠趕不上時代，而多少總有些落伍，就是爲此。這固然是無可如何的事，然使我們沒有深厚的崇古觀念，不要一切都以古人的是非爲標準；不要一切都向從前想，以致養成薄今愛古的感情，致理智爲其所蔽；總要好得許多。然而人卻通有這種弊病。這是什麼理由呢？難道崇古是人類的天性麼？不，決不。人類的所以崇古，是有一個很深遠的原因的。人類最親切的環境是社會環境，使人直接感覺其苦樂，前文業經說過了。在邃古之世，人類的社會組織，是良好過來的，此時的社會環境，亦極良好。後來因要求制馭自然的力量加強，不得不合併諸小社會而成爲大社會，而當其合併之際，沒有能好好的隨時加以組織，於是人類制馭自然之力，逐步加強，而其社會組織，亦逐步變壞，人生其間的，所感覺的苦痛，亦就逐步加深了。人類社會良好

的組織，可以說自原始的公產社會破壞以來，迄未恢復。而其從前曾經良好的一種甜蜜的回憶，亦久而久之，未曾忘掉。於是大家都覺得遼古之世，是一個黃金時代，雖然其對於遼古的情形，並不清楚。這便是崇古主義的由來。是萬人所共欲之事，終必有實現的一日的，雖然現在還受着阻礙。明乎此，則知今日正處於大變動的時代之中，但所謂變動，必以更高的形式而出現，而非如復古主義者之所想像，這便是進化的道理。

以上所述，自然不免挂一漏萬，然而最重要的觀念，似亦略具於此了。社會科學，直至今日，實在本身並沒有發見甚麼法則。一切重要觀念，多是從自然科學中借貸而來的。（註八）前敍循環等觀念，根本是從觀察無生物得來的無論矣，近代借徑於生物學等，似乎比古人進步了，然亦仍有其不適用之處。無論其為動物，為人，其個體

註八 並非說全沒有，但只是零碎的描寫，沒有能構成條理系統。

總係有機體，而社會則係超機體，有機體的條例，亦是不能適用於超機體的，如人不能恆動不息，所以一動之後，必繼之以一靜，社會則可以這一部分休息，那一部分換班工作，所以一個機關，可以永不停滯，這便是一個例。所謂社會科學，非從感情上希望其能夠如何，更非從道德上規定其應當如何，而是把社會的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發見其本身是如何，可以如何的問題。這便是第一章所說的學，而指導其應該如何，則只是第一章中所說的術。術是要從學生出來的，而我們自古至今，對於社會的學，實在沒真明白過，所以其所謂術，也從來不能得當。一般對於社會的議論，非希望其能夠如何，則斥責其不當如何，熱情塗涌，而其目的都不能達到，如說食之不能獲飽，試問竟有何益？社會學家說得好：「社會上一切事都是合理的，只是我們沒有懂得他的理。」這話深堪反省。努力研究社會，從其本身，發見種種法則，實在是目前一件最為緊要的事，而這件事和史學極有關係，而且非取資於史學，是無從達其目的，這便是史學的最大任務。

人的性質，有專門家和通才之分。在史學上，前者宜爲專門史家，後者宜爲普通史家。人固宜善用其所長，然亦不可不救其所短，專門家每缺於普遍的知識，所發出來的議論，往往會荒謬可笑。這是因爲一種現象的影響，只能達到一定的限度，而專門家把他看得超過其限度之故。普通史家，自無此弊，然普通史的任務，在於綜合各方面，看出一時代一地域中的真相，其所綜合的，基礎必極確實而後可，如專門的知識太乏，又不免有基礎不確實的危險。所以治史學者，雖宜就其性之所長而努力，又宜時時留意矯正自己的所短，這亦不可不知。

讀歷史的利益何在呢？讀了歷史，才會有革命思想。這話怎樣講呢？那就是讀了歷史，才知道人類社會，有進化的道理。從前的人，誤以爲讀了歷史，才知道既往，可爲將來辦事的準則，於是把歷史來作爲守舊的護符，這是誤用了歷史的。若真知道歷史，便知道世界上無一事不在變遷進化之中，雖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所以歷史是維新的證佐，不是守舊的護符。惟知道歷史，才知道應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

位；所當盡的責任。

有人說：「歷史上的因果關係，是很複雜的，怕非普通人所能明白，而普通的人對於歷史，也不會感覺興味。」這話亦不盡然。今日史事的所以難明，有些實在由於因果關係的誤認。譬如政治久已不是社會的原動力了，有些人卻偏要說：國家的治亂興亡，全由於政府中幾個人措置的得失，這種似是而非的話，如何能使人了解？如其是真實的：「現代機械的發明，到底足以使人的生活變更否？」「機械發明之後，經濟組織，能否不隨之而起變化？」「資本主義，能否不發達而為帝國主義？」「這種重大的變化，對於人類的苦樂如何？」「現在的社會，能不革命否？」這些看似複雜，而逐層推勘，其實是容易明白的，何至於不能了解？都是和生活極有關係，極切近的事情，何至於沒有興味？

版初月五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版再月四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法 究 研 史 歷

著 勉 思 呂

人 行 發
鎖 安 陳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〇 八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者 刷 印
廠 一 第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八 三 二 路 南 西 陝 海 上

編 主 泉 范 庫 文 識 知 年 青 集 十 二 共 輯 一 第

300 社會史 社會科學
國際問題研究注……金 雷
中國民族的由來……儲 坤
中國原始社會研究……林 炎
經濟學教程初編……鄭 子 田
400 語言和文字 語文學
自然科學 劉 宇
500 生物的進化 象……錫 金
600 細菌與人類 應用技術
司徒宗
印 刷 的 故 事……沈 子 復

700 現代歐洲藝術思潮……吳景崧
電 影 知 識……魯 思
800 文 學 概 論……顧仲彝
戰 爭 與 文 學……范 泉
青年寫作講話……孔另境
中國戲劇小史……周貽白
編 劇 與 導 演……方 君 逸
900 歷史研究法……呂思勉
羅曼羅蘭評傳……芳 信
地 球 新 話……吳 湘 漁

本 書 實 價

元